

论阿迪契创伤小说的叙事诗学^{*}

黄 夏

【内容提要】 创伤叙事是尼日利亚新生代女作家奇玛曼达·阿迪契介入现实的一种策略。在阿迪契的创伤小说中, 身体叙事通过表面的标记, 对个体与集体意识层面的抽象且无实体的创伤记忆进行具象化、实体化与符号化处理。非线性叙事则能契合创伤记忆的破碎、零散、不成体系等特性, 刻画出创伤主体在不同时空维度错综复杂的心态变化。对于创伤再现的见证危机, 阿迪契借助不可靠叙事来呈现后创伤视域下的伦理思考。总体而言, 阿迪契的创伤叙事是立足于尼日利亚与非洲社会的现实, 对以往人民经历的暴力压迫、分裂战争以及种族歧视等创伤性事件进行梳理和反思, 以此重新构建非洲在世界文学舞台中的叙述话语体系, 彰显出非洲作家的使命意识与责任担当。

【关键词】 阿迪契; 创伤叙事; 身体叙事; 非线性叙事; 不可靠叙事

【作者简介】 黄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 (武汉, 430079)。

作为尼日利亚新生代女作家, 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 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非洲文坛新秀, 被学界视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 (Chinua Achebe) 的传人。阿

^{*} 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2017 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洲文学史”(17FWW001) 的阶段性成果。

迪契对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现实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擅长以辛辣的笔触直击非洲社会的痛点,书写非洲生活中的苦难与悲怆,创伤(trauma)亦由此成为其创作实践中反复提及的关键词。从内容层面来看,阿迪契的三部长篇小说均涉及不同形式的创伤记忆,充分展现其文学创作的野心与魄力。《紫木槿》(*Purple Hibiscus*, 2003)书写了源于父权压迫与精神控制的家庭创伤;而《半轮黄日》(*Half of a Yellow Sun*, 2007)表现了国家分裂战争带来的历史创伤;《美国佬》(*Americanah*, 2013)则着重于刻画西方社会的种族身份政治背后的文化创伤,整体呈现为一种多元立体的创伤文学版图,可以将其归为“创伤小说”系列。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阿迪契的创伤书写,但主要是探讨其代表作《半轮黄日》,如张勇评价阿迪契的《半轮黄日》是“以非‘独调’性的多元化叙事形态建构起小说的历史创伤叙事”;^①或如伊曼纽尔·马扎罗·恩格维拉(Emmanuel Mzomera Ngwira)关注乌古人物引出的作者身份问题,认为《半轮黄日》运用“元小说”(metafiction)、“自反性”(self-reflexivity)等叙事元素来呈现创伤文本的生产过程。^②相对而言,关于《紫木槿》和《美国佬》的创伤研究成果较少,甚至鲜有学者从系统上追踪阿迪契的三部长篇小说共同构建的创伤叙事谱系及其诗学问题。

事实上,阿迪契在创伤书写方面所揽下的“写作任务”并非易事。由于创伤具有“延宕性”“潜伏性”“重复性”等特性,创伤事件在主体记忆中的再现“往往是时空倒错、碎片式的和无逻辑的,无法直接和全面地把控”,^③这对作家的写作功力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安妮·怀特海德(Anne Whitehead)指出:“在试验形式的界限时,创伤小说试图将叙述的本质和局限置于最显著的位置,传达创伤事件的毁坏和扭曲的冲击力。”^④面对创伤小说的叙事难题,阿迪契表现出超越年轻作家的老练,并别求新声、另辟蹊径,积极探索与创伤特性相契合的叙事手法,如身体叙事、非线性叙事与不可靠叙事等策略,形成独树一帜的创伤叙事诗

① 张勇:《大历史,小叙事——阿迪契〈半轮黄日〉中的历史创伤叙事》,《当代外国文学》2019年第3期,第76页。

② Emmanuel Mzomera Ngwira, “‘He Writes about the World That Remained Silent’: Witnessing Authorship in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Half of a Yellow Sun*”, *English Studies in Africa*, 2012, 55 (2), p. 43.

③ 何卫华:《创伤叙事的可能、建构性和功用》,《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73页。

④ [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94页。

学。而且,从创作目的来看,创伤书写只是阿迪契介入现实的一种方式,其最终旨归是解决尼日利亚与非洲社会固有的“沉痾旧疾”。通过这些创伤叙事策略,阿迪契成功观照了尼日利亚及非洲人民在暴力压迫、分裂战争以及种族歧视等重大创伤事件中的生命体验与生存危机,并以此重新构建非洲在世界文学舞台中的叙述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伦理反思意识。

一 隐形的伤痕与身体叙事

从词源来看,“创伤”一词最早在医学意义上是指身体或物理层面的伤口,而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创伤的概念越来越抽象,从一种肉眼可见的伤口逐渐发展为个体乃至集体无意识的悲怆。这种潜藏在精神意识层面的痛楚,是一种无法直观感受的隐形伤痕,给创伤的再现造成明显的障碍。对此,阿迪契的应对策略是重新回到创伤的起点,通过身体叙事来展现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漩涡。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曾在其著作《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中断言现代叙述出现了身体的符号化(semioticization)以及与之对应的故事的躯体化(somatization)的趋势,认为“身体必定是意义的根源和核心,而且非得把身体作为叙述确切含义的主要媒介才能讲故事”。^①作为一种生理客体,身体承载着主体在创伤事件或灾难语境中的感官体验,同时记录着其“被撞击、敲打、碾碎,进而被摧毁”^②的受创过程。当这些被特殊标记的身体进入创伤叙事活动之时,实际成为另一种强有力的符号能指,为创伤主体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某种可能:用身体标记代替口头言说,以最简单的方式触及及其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正如伊莱因·斯卡里(Elaine Scarry)所说,身体的疼痛与语言结构的对抗,是促使主体回到一种前语言阶段,即“恢复到人类学会语言之前的发声与哭泣的状态”。^③

①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第2页。

② [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第3页。

③ Elaine Scarry, *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4.

身体是进行创伤展演的公共空间,可以将个体私密的、抽象的、隐形的创伤体验转换成一种公开的、具象的、可见的叙述文本。尤其是在叙述者选择沉默的语境中,身体层面的标记便成为“一个最终会在叙述中的恰当时机被阅读的符号”,^①有助于受述者辨认和识别创伤事件中不同主体的身份。在《紫木槿》中,相比于“鸟吃食”般的声线,母亲比阿特丽斯脸上的伤痕更能证明其遭受虐待和家暴的创伤经历,并对施暴者尤金构成有力的控诉。“当时她的眼睛很肿,又黑又紫,像熟过了头的鳄梨。”^②除此之外,文中还提到哥哥扎扎受伤的小指,康比丽被迫剪短的指甲、被烫伤的双脚,等等。一方面,这些身体的标记见证了兄妹俩共同经历的父权压迫与精神控制,说明他们处于一种丧失主体性的极度弱势状态;另一方面,他们不惜以如此孱弱的身体与强权对峙,以小博大,凸显出一种不容小觑的颠覆性与反抗性。而针对尤金身体的叙述,主要是强调其作为独裁者或施暴者的身份。“他的脸看上去已经肿了起来,遍布着发脓的疹子,而且还在继续膨胀。”^③尤金脸上出现的肿、发脓、膨胀等症状,是一种无比畸形和怪诞的身体状态。据巴赫金研究,怪诞的身体是不会定型的,它永远都处于建构中、形成中,“总是在吞食着世界,同时自己也被世界所吞食”。^④

怪诞的身体状态,象征着尤金在家宅空间中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其权力的基础是尼日利亚社会父权至上的性别结构。但如果将尤金放置在更大的权力话语体系即军人独裁政治局面中,这个人物便显得势单力薄了。因为得力编辑阿迪·考克的意外去世,尤金的民主事业元气大伤,他的脸相对应出现了凹陷、萎缩的症状:“那几个周里,他的眼睛后面出现了两个凹洞,好像有人吸去了那里的血肉,他的眼睛陷进去了。”^⑤这些身体层面的变化预示着专制家长与独裁政治对抗的悲剧走向,为我们刻画出尤金人物背后不为人知的脆弱与无奈。不断吞食他者生存空间的尤金,如今也成为被他者吞食的对象,甚至迎来被妻子

① [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朱生坚译,新星出版社,2005,第28页。

②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阿迪契:《紫木槿》,文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9页。

③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阿迪契:《紫木槿》,文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6页。

④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368页。

⑤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阿迪契:《紫木槿》,文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164页。

比阿特丽斯下毒的结局。这恰恰是阿迪契的高明之处：以一位暴君陨落的全过程，追溯家庭创伤的源头，进而批判尼日利亚及非洲大陆的父权至上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政治话语体系。

至于饥饿、疾病甚至是死亡等反常的身体状态，则可以重点渲染创伤事件的极端语境，比如分裂战争的残酷、沉重与压抑氛围。在《半轮黄日》中，阿迪契将笔墨放在饥饿的身体上，其目的是书写比亚法拉曾因北部政府的军事封锁而陷入大面积饥荒的历史创伤。“这个孩子的肚子最近看上去像是吞吃了一个大球，头发一簇簇地掉落，皮肤颜色变浅，从红褐色变成病恹恹的黄色。其他四个孩子经常调侃他。他们经常叫他面包果肚子（Afo mmili ukwa）。"^① 这只如“吞吃了一个大球”的肚子是一种夸张化处理，为我们勾勒出比亚法拉人民艰难的生存状态。在战争期间，很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都不能得到保障，被迫沦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的难民。天真的孩子并不明实情，他们想到的外号“面包果肚子”极具讽刺意味，戏谑的玩笑透露出的是粮食短缺与物资匮乏的残酷现实。再者，由于长期未能摄入充足的粮食，身体的过度饥饿导致免疫力急剧下降，与之相伴而来的便是疾病的困扰。在奥兰娜的女性视角里，她看到自己的月经变得稀少、孩子的头发出现脱落、记忆力不断衰退……其中，“面包果肚子”便是集中呈现在孩子身上的恶性营养不良病症，比亚法拉地区的人称之为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综合征，实际是想以英国首相的名字来影射英国政府对尼日利亚内战的干涉。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战争双方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演变到最后势必会出现民不聊生、路有饿殍，甚至尸横遍野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尸体意象是阿迪契的创伤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身体叙事片段，营造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绝望感。经历过战场厮杀的乌古，他在重伤后的第一次苏醒时，看到了犹如地狱的尸体摆放景象：“他们把他留在医院里，他不再想死，但他担心自己会死；他的四周乱扔着许多尸体，席子上，床垫上，光秃秃的地上，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鲜血，如此多的鲜血。”^② 由这个场景可知，战争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医院的承载能力，弥漫在医院里的死亡气息如此凝重，给幸存者的视觉、嗅觉、

①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半轮黄日》，石平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437页。

②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半轮黄日》，石平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430页。

触觉以及听觉等感官带来极大的冲击。有史学家称此次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00万~300万人,几乎摧毁了这个新生且脆弱的统一国家。^①个体生命的死亡折射出的是民族国家的灾难,这场内战使得新生的尼日利亚国家政权错失了稳步发展的良好契机,当中的损失与内耗是难以估计的。近30年后,康比丽梦中的知识分子,仍是以破碎尸体的惨状出现——“我梦见阿迪·考克烧焦的身体碎块散落在餐桌上,在他女儿的校服上,在那个婴儿的麦片碗里,在他那盘鸡蛋上”。^②康比丽的噩梦真实地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军人独裁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气氛,有力地证明了后内战时期尼日利亚社会民主建设事业依旧面临重重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身体叙事已是超越生理层面疼痛的文化苦难书写。阿迪契的创伤小说中的尸体意象成为战争创伤与民族悲剧的隐喻,这不单是尼日利亚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关于自近代以来非洲大陆深受民族矛盾、地区冲突、独裁政治等桎梏之苦的历史叙述。

进入西方社会的文化空间,非洲黑人的身体特征变成一种扁平化、类型化的种族脸谱,实质是极具创伤性的身份政治问题。在《美国佬》中,人物的发型变化微妙地展现了非洲移民在白人主流社会遭遇的种族歧视与文化创伤。为了提高面试的成功率,乌莱姑姑决定解开自己的发辫,“假如你有辫子,他们会认为你不专业”。^③刚到美国的伊菲麦露并未能理解头发背后的审美霸权,而当她同样需要拉直头发来获得面试官的认可之时,这段惨痛的身体记忆便成为其种族身份意识觉醒的关键。“起先,伊菲麦露只感到轻微的灼痛,可当美发师要冲洗掉直发膏时,伊菲麦露的脑袋后仰靠到塑料水池上,针刺般的疼痛从她的头皮的各个部分升起,下传至她身体的各处,再重新回到头上。”^④这些生理性痛苦皆是乌莱姑姑和伊菲麦露改造身体特征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其象征的是黑人因自我否定与自我怀疑引发的创伤体验。她们在无意识之间戴上否认黑人身份的“白面具”,接受了主流社会崇尚的审美标准,由此参与了文化创伤的再生产过程。“所谓理想的头发都是参照白人的审美标准,其中包括修长而顺直(通常是金黄色),也就是要求头发不能是古怪或卷

① Toyin Falola and Matthew M. Heaton, *A History of Niger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8.

②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紫木槿》,文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164页。

③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美国佬》,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20页。

④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美国佬》,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206页。

曲的。”^① 在白人主导的文化场域中，非洲黑人原本的黑皮肤、卷曲发等相貌特征，被视为一种相对白人的次等、丑陋、低下的标志，甚至以此作为衡量他们道德、智力和专业水平的标准与尺度。身处其中，非洲黑人很有可能受到主流文化的强势支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西方社会的权力话语，或与之合谋，将自我放置在“二等人民”的历史坐标上，最终动摇他们对本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自信。由此可见，从黑人的头发到种族身份政治的跃迁，阿迪契不仅书写出非洲移民在异国他乡的创伤体验，而且打通了生理与心理乃至历史与文化层面的脉络，真正做到细致入微、由小见大，展现出独具匠心的创伤叙事艺术。

二 记忆的碎片与非线性叙事

自亚里士多德肇始，追求故事的连贯性、同质性与统一性的观点在很长时间内占据着西方文学的主流地位。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完整的事件是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的，“事件的结合要严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② 近代以来，随着叙事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这种理想的线性故事越发难以实现，如 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采取线条的意象来探讨小说中的一连串事件，作为思维之工具的该意象本身都具有潜在的矛盾性”。^③ 在创伤事件的极端语境中，这种线性叙事活动的矛盾性更是代表着一种“不及物写作”，即“书写者或讲述人不是超然于所讲述的事件之外来讲述，而是处于事件当中”。^④ 创伤事件所带来的强烈冲击与巨大震撼，早已超出人类的接受范围，以至于留存在创伤主体大脑中的记忆是碎片化、零散化、无序性的，他们无法用语言完整地叙述自我创伤经历的始末。面对创伤记忆的这些特性，阿迪契很自然地选择非线性叙事策略，以复杂、无序、多变的叙事时空体来刻画人物凌乱、崩溃、破碎的创伤体验，由此表现出不同时

① Ingrid Banks, *Hair Matters: Beauty, Power, and Black Women's Consciousness*,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

②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第 78 页。

③ [美]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46 页。

④ 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国外文学》2008 年第 4 期，第 27 页。

期尼日利亚人民经历暴力、混乱与分裂的社会现实,以及非洲移民在全球化时代遭遇的身份危机与文化困惑,等等。

在其创伤书写实践中,阿迪契经常打断叙事时间上的单向、连续、统一的线性进程,并由此延伸出不同于主线的叙事副线,着重表现出创伤患者挣扎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等双重时空的痛苦与绝望。从本质上讲,创伤患者讲述的故事是一种双重叙述,他们的意识不断游走在之前面对的死亡威胁与其衍生的生存危机的并置时空语境中,所呈现的状态自然也是在创伤事件的不可承受性与生存的不可承受性之间的摇摆。^①换句话说,创伤患者不仅要面对幽灵般的苦难过往,而且其余生都要背负着痛苦的创伤记忆。他们的生存现实是一种停滞的双重时间:一边是反复重演的过去,一边是无法更新的未来。

以《紫木槿》为例,圣枝主日便是小说中十分关键的节点,是康比丽叙述家庭创伤、回顾过去伤痛的时间线索。在小说的前三章,康比丽以圣枝主日为界,划分出当天、之前及之后的三个时空,并按照上述的顺序依次叙述各个时间段发生的创伤事件。具体而言,在圣枝主日当天,康比丽目睹哥哥扎扎的“反常”表现——不仅没有去领圣餐,且对父亲的威慑无动于衷。哥哥的反抗行动促使康比丽展开叙事的“第一次”闪回,并诱发其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对比在自己家与在伊菲欧玛姑妈家的不同经历,逐步察觉到自身及其家人的创伤体验。在这之后,康比丽转回圣枝主日的话题,重新将断裂的事件接续起来,开始描述在“打碎神像”后发生的家庭悲剧。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指出:“研究叙事的时间顺序,就是对照事件或时间段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和这些事件或时间段在故事中的接续顺序,因为叙事的时序已由叙事本身明确指出,或者可从某个间接标志中推论出来。”^②乍一看,康比丽只是将圣枝主日的“打碎神像”事件抽离出来,看似在叙述其他事件之时并没有出现时间的倒错,但对照故事的“现在时”便会发现,康比丽已经身处“打碎神像”的三年后,之前的一系列叙述活动都是其记忆的碎片。阿迪契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故事横截面即“打碎神像”事件作为《紫木槿》的开局,首先为我们刻画了被禁锢在过去创伤语境中的康比

①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

②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4页。

丽，同时重点描摹出康比丽家中主要成员的性格画像：暴虐的父亲、沉默的母亲、“叛逆”的哥哥。这不仅提前奠定了压抑、窒息、恐怖的叙事基调，还充分调动读者见证康比丽创伤经历的积极性，在追踪的过程中反思其家庭创伤何以形成。

在《美国佬》中，阿迪契在掌控叙事时间方面的表现越发炉火纯青。阿迪契利用不起眼的玛利亚玛非洲编发沙龙作为叙事空间，对伊菲麦露的创伤记忆进行了蒙太奇式的拼贴展演，极致地表现了非洲移民在种族身份政治之下的彷徨、凌乱、无助。为了保证现在与过去双重时空的自然过渡效果，阿迪契运用了丰富的电影转场技巧，使得空间与时间的转换融为一体、天衣无缝：既可以由一组头发的特写镜头回到过去的尼日利亚，“伊菲麦露从小在母亲头发的阴影下长大”，^①亦可以由美发沙龙的燥热气氛转向13年前的美国，“每次的热浪均令伊菲麦露想起她刚来时度过的第一个夏天”。^②通过意识的流动，伊菲麦露想起自己就业之时曾因为种族歧视而多次受挫，并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令其终生难忘的创伤事件——接受了网球教练的“按摩”工作。在这段回忆中，阿迪契掺杂了“现在时”即事业有成的伊菲麦露的价值判断，而不仅仅是表现当时人物内心的痛苦与无助。伊菲麦露否认将自我的创伤经历简单归结为一种忧郁症，她在过去与现实的交叠对比中向西方社会的文化暴力提出质疑。“忧郁症是美国人得的病，他们出于自我开脱的需求，把每一样东西都说成病。她没有患忧郁症，她只是有一点疲惫，有一点迟钝。‘我没有忧郁症。’她说。多年后，她会在博客上写到这件事：‘关于非美国黑人得了他们不肯承认名字的病的话题。’”^③在此，阿迪契将过去与现实两个时空混杂在一起，打乱了故事时间自然的排列组合，创设出一种共时性的双重叙述语境，从而对比受到重创的主人公在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如此一来，故事情节便可以从现在、过去以及过去的过去、过去的未来等时空之间来回跳转，呈现一种碎片化而又有迹可循的创伤叙述：一方面重申了创伤记忆的零散无序表征，另一方面则凸显出受创的主人公所经历的成长。

相比于另外两部小说，《半轮黄日》的叙事时空结构是最为特殊的，

①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美国佬》，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41页。

②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美国佬》，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04页。

③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美国佬》，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60~161页。

更接近于一种拼图式叙事。阿迪契将不同的叙事片段错落放置,组成一个无序、非线性、毫无章法的故事地图。她有意将内战爆发的60年代拆分成四个时空,即把60年代初与60年代末交替放置,以形式上的“乱局”来呈现民族国家的混战局面以及创伤患者的精神错乱。从亲历者来看,乌古、奥兰娜和理查德身份各异,阿迪契安排他们分别从阶级、性别与种族的不同视角见证战争的残酷与血腥,且他们各自所占的篇幅比重大体相同,确保创伤叙事上的不偏不倚。如此一来,不同叙事线索同步向前推进,小说整体便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叉的网状叙事格局。除了安排多条线索的叙事结构之外,阿迪契在《半轮黄日》中尤其强调“现在时”的叙事时间,营造出一种特别的“在场”感,为早已掩埋在历史深处的战争创伤增加一些真实感。赵静蓉指出,“在伤害发生时,记忆的主体必定是在场的”。这种“亲历性”是创伤记忆最核心的因素:要么是在空间上具有场地性,要么是在时间上具有即时性以及广义上的时段性。^①

阿迪契充分运用亲历者的感官体验,去记录分裂战争的血腥、暴力、残酷,并通过幸存者的身份不断延长他们观察的时限,可以将一段惨痛的战争历史转化成一幕鲜活的“现场直播”,极大地强化了“亲历性”。比如小说中提到一场血洗哈科特港的空袭,凯内内和理查德亲眼看见仆人伊凯基德被轰炸机投下的弹片削去了脑袋,以一种极其痛苦的方式死去:“理查德看向别处,然后又瞥了伊凯基德一眼,他的头却不见了。他的身体略微前倾,双臂四下挥舞,仍在跑动,唯独头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鲜血淋漓的脖颈。”^②伊凯基德断头的遭遇只是尼日利亚内战百万牺牲者的一个缩影,这“鲜血淋漓”的一幕令目击者凯内内和理查德触目惊心。这样的“在场”感凸显出创伤事件的某一个横截面,但并没有完全将战争历史限定在一个封闭的时间段中,从而使得创伤书写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灵活性和解构性。

结合作家本人的身份背景来看,阿迪契生于战后的70年代,没有亲身经历民族灾难,关于内战的故事素材很大部分来源于家庭谈话和书籍资料,其创作的过程不仅包含着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还涉及了后来者对历史创伤事件的价值判断。尤其是这种回顾先辈经历的创伤性事件的

① 赵静蓉:《创伤记忆:心理事实与文化表征》,《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1页。

②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阿迪契:《半轮黄日》,石平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346页。

叙述，是“通过记忆重演反思创伤带来的延续性破坏”，^①对阿迪契而言是为了反思分裂战争给民族国家带来的历史后遗症，从而重构尼日利亚社会对现代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与精神归属。

三 见证的危机与不可靠叙事

从创作主体来看，见证文学属于经历过毁灭性战争、种族大屠杀等浩劫性事件的幸存者的自传性叙述，其真实性主要依赖“作者不容许自己拥有小说家那样的自由，不容许他的‘我’一步跳入其他人物的‘内部’，把他们各自的主观世界一一呈现出来”。^②在灾难之后，幸存者需要对受众或读者说出实情，他们所提供的创伤叙述文本，理应对历史或事件的真相负有伦理责任。然而，在创伤叙事活动中，这种见证的真实性是极其脆弱的。从客观层面来看，创伤事件涉及的非人道暴行，对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冲击，致其记忆出现紊乱、扭曲，他们在事后很难将创伤记忆组织成条理清晰的叙事记忆。从主观因素来看，出于个体的自卫机制，创伤主体有可能会隐瞒一些对自身不利的事实，只会选择部分呈现创伤事件的样貌。对于叙述的不可靠问题，韦恩·布斯（Wayne Booth）认为是源自“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的不一致。^③这种不一致既有可能是事实层面的，叙述者在记录故事的时候出现偏差，如遗漏信息或夸大事实；也有可能是价值层面的，叙述者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做出公允的判断。

在不可靠叙述的理论视域下，关于创伤叙述的争议主要围绕其见证的真实性与否展开，即创伤记忆的叙述版本与创伤事件的实际情况是否一致，其中又蕴藏着多少有待探究的心理动机和伦理意识？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见证叙事所引发的“见证的危机”，实质指向的是伦理的危机。^④作

① 王欣：《创伤记忆的叙事判断、情感特征和叙述类型》，《符号与传媒》2020年第2期，第187页。

② 〔法〕克洛德·穆沙：《谁，在我呼喊时：20世纪的见证文学》，李金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18页。

③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58-159.

④ 陈全黎：《伪证：见证叙事的伦理问题》，《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第153页。

为创伤叙事的受众,读者则需要超越叙述者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推断出创伤事件的本来面目,并进一步还原创伤主体的心路历程。可见,从不可靠叙事切入,有助于我们具体评估创伤叙事的表达效果,并重新审视叙述者与幸存者双重身份的张力,反思阿迪契对人物的创伤体验及其价值判断的伦理思考。

对于涉及分裂战争或民族冲突等宏大的历史叙事,幸存者的创伤叙述的真实性是有待推敲的。多里·劳伯(Dori Laub)指出,历史是无须见证而自足存在的:不仅是因为事件的现实情况和缺乏反应的旁观者,也是因为身处事件的内部,证人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即作为“能够跳出事件发生之时强势的极权主义和非人道的框架,而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参照系来观察事件”^①的个体。

在《半轮黄日》中,乌古是三位亲历者当中真正上过战争前线的人,所以书中关于双方作战的正面描写主要来自乌古的视角。他向读者描述了战场双方厮杀的血腥与残酷,塑造了自己死里逃生的受害者形象,却选择对施暴者的创伤记忆有所保留。以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话说,即“为了逃避对自身罪行的追究,施暴者会竭尽全力推进遗忘,保密和沉默是他们的第一道防线”。^②作为阿迪契认定的作者形象,乌古在其写作的文本中梳理了国家的独立、内战时期的饥荒、针对伊博族的屠杀等历史事件,但并未提及自己与队友抢占居民用车、在酒吧集体强奸女招待事件。正如申丹所说:“叙述者的‘可靠性’问题涉及的是叙述者的中介作用,故事事件是叙述对象,若因为叙述者的主观性而影响了客观再现这一对象,作为中介的叙述就是不可靠的。”^③根据小说现有的叙述版本,乌古是在队友的“精神绑架”之下对妇女施暴的,看似摘除了其作恶的嫌疑,但过程中仍有“一种引发自我憎恨的释放”,^④他无法否认自我在暴力活动中获得的强烈快感,向读者暴露出更为复杂的心理活动与情绪反应。这些无法对外言说的施暴经历,恰恰印证乌古身份的

① Dori Laub, “An Event Without a Witness: Truth, Testimony and Survival”, in Shoshana Felman, Dori Laub, eds.,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81.

②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p. 8.

③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137页。

④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阿迪契:《半轮黄日》,石平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399页。

两面性：既是分裂战争的牺牲品，承受着“战争创伤带来的难以治愈的青春之痛”；^①亦是他者创伤的施暴者，被迫站在女性受害者的反面。尤其是结合文中另一个小女孩乌仁娃被神父侵犯后的结局，我们不难推断，酒吧女招待在经历如此痛苦的创伤事件后，极有可能需要独自承受意外怀孕的后果。由此，通过乌古的不可靠叙述，我们除了能看到青少年群体经历的战争创伤，还可以看到妇女群体在战争期间遭受的性别暴力。这是阿迪契有别于乌古代表的男性作家群体的创作视角，她重新发现了被男性叙事传统遮蔽的女性声音，为我们挖掘出更为悠远绵长的性别创伤记忆。

英国白人理查德对经历种族屠杀的伊博族人缺乏一种真正意义的共情，而无法提供一份可靠的创伤文本，主要是受其族裔身份以及文化立场影响。“镜子里的他没有任何变化，眉毛依旧无所顾忌地竖起，眼睛依旧是教堂彩色玻璃中的蓝色，他感到异常震惊。他的面容应该因目睹的一切而变形。他的羞耻应该在脸上留下红色的疮子。当他目睹恩纳埃梅卡被枪杀的时候，他并未感到震惊，而是万分庆幸凯内内没有与他在一起，因为他无力保护凯内内，他们会察觉到她是伊博族人，开枪打死她。”^② 鉴于其与凯内内的情侣关系，理查德知道自己“应该”对伊博族人担负伦理责任，“应该”为目睹血腥的屠杀产生强烈的悸动，“应该”利用记者的身份去记录非人道的暴行。而实际上，理查德并不能将“应该”变成现实，他从镜子的投射中看到一个“置身事外”以及无法排解满腹疑惑的自我，代表的是旁观者无法对异族灾难感同身受的伦理立场。包括理查德多次尝试书写尼日利亚的故事：从《盛手的篮子》到《套绳青铜罐的时代》，再到聚焦比亚法拉苦难的《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他始终未能突破写作瓶颈，无法触及创伤叙事的内核。在此，理查德人物的不可靠叙述明显是阿迪契有意为之，这不仅是为了证明其所代表的西方叙事传统对非洲而言始终是一种“他者的凝视”，表现出创伤叙事所面临的主体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理查德设想的书名《我们死去时世界沉默不语》最终被乌古挪用，并付诸文本内嵌于故事中，暗含着阿迪契作为新生代非洲作家的野心与魄力：大胆挑战以往西方文学对非洲叙事的强势地位，重新在世界文学舞台夺回非洲书写的权利，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① 王卓：《后殖民语境下〈半轮黄日〉的成长书写》，《外国文学》2022年第2期，第29页。

② 〔尼日利亚〕奇玛曼达·阿迪契：《半轮黄日》，石平萍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170页。

在处理个体创伤经历方面,创伤患者的认知水平与知识体系是影响其叙述话语之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像《紫木槿》中不可靠的创伤叙述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康比丽自身年龄以及家庭地位的限制。面对父亲在家宅空间实施的诸多暴力,年幼的康比丽并不能准确认知其性质,甚至尝试将父亲的行为合理化,掩饰悲剧的事实。当父亲殴打母亲之时,康比丽将楼上的撞击声“想象是门卡住了,而父亲正在努力打开它”;^①而自己因为体罚晕倒住院之时,班上的同学们听到的消息是“从一场车祸中幸存”^②……这些反应其实都属于受虐儿童常见的心理调适机制,对于无法承受的事实,他们选择“自我改造”,即“通过心理防御,虐待不是被隔离在意识和记忆之外,仿佛从未发生过,就是被淡化、合理化和原谅,这样一来不管发生什么都称不上虐待”。^③作为家中的小女儿,康比丽无论在年龄还是性别上都处于极度的弱势状态,导致其第一人称视角出现观察的“盲区”,极大地削弱了创伤叙述的可靠性。在《美国佬》中,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伊菲麦露敢于在博客平台中披露美国社会针对黑人群体的种族政治。而对于自身遭遇的“性侵”事件,伊菲麦露从未对外言说,直到回国才选择告知初恋男友奥宾仔真相。对比之下,伊菲麦露越是能大胆书写黑人群体的文化创伤,反而越能凸显出其内心无法言说的性别创伤经历,这种创伤叙述的不可靠便是人物自主选择的结果。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秘密的保守和泄露也始终有一个伦理维度。”^④最初伊菲麦露选择对创伤经历缄默不言,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而当她选择向奥宾仔分享自我的秘密,是为了寻求他者的情感慰藉。置身在他们熟悉而亲切的沉默里,伊菲麦露感觉自己是“安全无虞”的,重新拾得一份独属于拉各斯的救赎。^⑤

对于人物提供的不可靠叙述文本,阿迪契并非站在创作者的角度去苛责他们有所保留、自欺欺人,甚至是掩过饰非的行为。相反,她是出于一种温情的视角去书写他们内心压抑的创伤、痛苦与恐惧,并尽可能

①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紫木槿》,文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27页。

②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紫木槿》,文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170页。

③ 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p. 102.

④ [美] 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92页。

⑤ [尼日利亚] 奇玛曼达·阿迪契:《美国佬》,张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447页。

体认他们无法面对创伤事件真相的心理事实，体现出创伤书写的伦理关怀。再者，阿迪契创伤小说的不可靠叙事也让读者看到了见证文学的限度：永远留存一块“不可见”或“不可说”的空间，促使我们从系统或结构的层面反思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创伤患者不能触碰的禁忌话题。

结 语

奇玛曼达·阿迪契是近年来颇具光环的当代非洲文坛新星，凭借其出色的小说创作拿下多项国际性大奖，成为“尼日利亚的新晋代言人”。就其创作而言，阿迪契的三部长篇小说以一种极其开阔的社会视野进行创伤书写与伦理反思，披露尼日利亚与非洲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父权压迫与独裁政治，民族矛盾与分裂势力，种族歧视与文化霸权……在创伤书写的具体实践中，阿迪契探求突破传统的写作路径，选取了与创伤记忆的特性相吻合的叙事策略。身体叙事通过人物表面的伤口、接收的感官刺激等方面，对个体乃至集体意识层面的抽象且无实体的创伤记忆进行具象化、实体化、符号化的处理。非线性叙事则能契合创伤记忆破碎、零散、不成体系等特性，有助于刻画出创伤主体在不同时空维度错综复杂的心态变化。对于创伤再现的见证危机，阿迪契借助不可靠叙事来呈现后创伤视域下的伦理思考。在此期间，阿迪契从通过身体的标记关注主体的创伤经历，到探讨创伤记忆如何转化为叙事记忆，再到反思创伤叙事的表达效果，层层递进，一步步去深入触及创伤问题的核心。与之对应的是，创伤叙事架构的空间场域亦是由一个伊博族家庭，转到一个国家即尼日利亚，再到欧美社会乃至全球场域，由点及面，由此生发出更具普适性的伦理思考。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创伤记忆具有“见证过去、反思现实以及建构历史”的结构性意义。^①而阿迪契的创伤叙事正是立足于盘根错节的现实情况，回到幽暗深远的历史岁月，清算那些不为人提及的悲怆与痛楚。尤其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阿迪契对创伤问题的反思亦有助于重新建构非洲在世界文学舞台中的叙述话语体系，并进一步为非洲人民书写更具可能性的未来。

【责任编辑】杨惠

^① 赵静蓉：《作为方法论的创伤记忆》，《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74页。

Keywords: Soyinka; *Season of Anomy*; Multidimensional Space; Wandering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taphor

The Narrative Poetics of Adichie's Trauma Novels

Huang Xia / 159

Abstract: Trauma narrative is the strategy of intervention in reality by Nigerian third-generation female writer,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In Adichie's trauma novels, the body narrative visualizes, substantializes and symbolizes the abstract and disembodied traumatic memories at the level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physical marks. The non-linear narrative 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uma memories such as fragment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which explores the complex changes of the traumatized subjects in different space-time dimensions. As for the witness crisis of trauma narrative, Adichie takes the unreliable narrative to present ethical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trauma. Based on the Nigerian and African society, Adichie reflects on the traumatic events such as domestic violence, civil war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history by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narrative discourse system about Africa in world literature which highlights the miss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African writers.

Keywords: Adichie; Trauma Narrative; Body Narrative; Non-linear Narrative; Unreliable Narrativ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Zheng Song / 174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n Africa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Chinese language spreading network. At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African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is favorable, and their development shows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and localization. However, their geograph-